往事

--1967-1969写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事——1967－1969 写真

目录

王　东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 (1)
范　硕　北京"二月逆流" …… (2)
刘东之　"一读骚经一肃然" …… (18)
王　东　刘少奇的三顶大帽子 …… (24)
蒋　铎　周恩来在 1968 …… (27)
蒋　铎　林彪笑里藏刀 …… (33)
官伟勋　我所知道的林彪和叶群 …… (39)
王　东　林彪叛逃 …… (82)
王　东　文革中的时装 …… (84)
王　东　文革时的改名 …… (86)
柳　萌　我所知道的"内人党"及其他 …… (88)
赵大年　"牛棚"的日子 …… (103)
英　夫　团中央五七干校一段情 …… (112)
许　林　《人民日报》干校片断 …… (118)
叶延滨　知青岁月 …… (130)
张春熙　"工作组"与"支左" …… (135)
蒋元明　毛主席像下的故事 …… (141)
蒋元明　当兵西北 …… (143)

兵团岁月

范凡生　我的大学——北大荒 …… (150)
杨　越　北大荒的记者生涯 …… (154)
郑　毅　扛麻袋 …… (160)
赵树燕　养猪 …… (163)
邓小南　当小学老师 …… (169)
曹有涌　外调 …… (173)
杨南鸾　"清边" …… (178)
管祖德　看电影 …… (181)
吴光华　董　彦　"老K" …… (187)

珍宝岛事件

范　硕　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 …… (190)
王　田　到苏联大使馆抗议游行 …… (192)
董浩镜　去珍宝岛的第一天 …… (194)
张希平　难忘"三·一五" …… (198)
高世杰　"T62"坦克 …… (204)
任胜利　支前日记 …… (206)
陶大钊　越南战场见闻 …… (213)
郑　骏　独特而全新的历史视角 …… (223)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王 东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8日，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都给上海造反派团体发了贺电，《人民日报》发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

上海发生了一场革命风暴，停水，停电，停交通，到处造反，一下冒出很多的造反司令部。报社派我和一位同志去上海看看。我们听完唐平铸总编报告后就出发了。一出上海火车站，就看到一条大标语 打倒唐平铸！怎么昨天唐平铸还好好的，今天就被打倒了？

我们想找一下上海市一级造反派司令部了解一下情况，打听多处，谁也不知道这个司令部在哪里，又说他们就是总司令部，在一个宾馆找到一个总司令部，到处乱哄哄的，把我们安排在一个仓库住下，没有床，只有一堆棉花套，一月份上海还是很冷的，一人盖上两个棉花套。在半夜，造反派说，他们要出去执行任务，让我们睡觉。天亮他们回来了，带回一些面包，让我们吃。我们感到这里不像个什么总司令部，又另找别的地方去了。

往事——1967－1969 写真

北京“二月逆流”

范 硕

大闹“京西”

提起 1967 年“文革”往事。人们不能不想起威震华夏的“大闹京西”。当时，我正从南方出差到北京，一位首长在京西宾馆开会，只听说“闹”得很厉害，不敢打听，未知其详。若干年后，因工作需要，曾聆听叶剑英元帅讲起此事，又访问当时参加会议作纪录的同志，才弄清内幕。

1967 年 1 月 19 日。这天下午室外温度在零下十度以下，寒风袭人。但是京西宾馆一个大会议室里却热气升腾，充满火药味。

这里名义上是开会——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实际上却摆开了“唇枪舌剑”的战场。会场上靠北面第一排中间座椅上坐着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和叶剑英元帅三位军委领导人。同排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康生、江青、叶群等人。江青紧挨着叶帅坐着。下面依次坐着各总部、各大军区领导同志，以及空军、海军、各军兵种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共 40 多人。

会议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展开了争论。

江青、陈伯达、康生、叶群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不能特殊，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则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维护军队的稳定。他们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他质问道：“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大闹“京西”时的叶剑英。

但是，江青一伙仍然摆出种种理由，坚持军队搞“四大”。突然拿总政“开刀”。叶群站起来，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发起攻击，说肖华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把许多罪名强加在肖华头上，要他当晚向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

往事——1967－1969 写真

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说，肖华是个“绅士”，不是个“战士”，说他“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肖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肖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否则，要调换总政主任。这是明目张胆要撤肖华的职！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肖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到会的同志一听便不吭声了，以沉默表示对抗。大家心里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终目的是要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肖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令人奇怪的，这天晚间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整个北京发生了轰动事件，满街都是“打倒肖华”的大字报。“造反派”连夜向肖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围住肖华的家去抓他。肖华听到前门有人敲门，就从后门离开，跑到傅钟家，坐上一辆小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起来。

第二天，2月20日上午，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原班人员继续争论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明知“造反派”昨晚抓肖华的事，看到肖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看到没人搭理她，又幸灾乐祸地说：“好啊！总政主任不见了，开小差了？”故意扭头看叶剑英。叶帅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说来也巧，这时肖华突然来了。徐向前想缓和一下气氛，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没有作答。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得势不饶人，紧追不舍。这时，会场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突然，一直沉默的叶剑英，指着肖华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

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骨折。可见他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后来，我见到叶帅，问他“大闹京西”之事，他仍然一脸正气地伸出右手给我们看，手掌已经恢复正常了。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老帅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肖华。叶剑英得知这一情报，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总理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被暂时压了下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肖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来。

这就是当年“大闹京西”的大致情形。这个“大闹”实在是“闹”得好，好得很！它实质上是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元帅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次公开抗争，抵制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维护了军队的稳定局面。

大闹“怀仁堂”

如果说“大闹京西”，拉开了斗争的序幕，紧接着发生在怀仁堂的一场“大闹”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公开抗争的继续，其规模更大，斗争更复杂，影响更深远，为文革开始以来所没有的。

1967年初，来自上海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全面夺权”，其矛头首先冲向中央。从1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处于“靠边站”的地位。这种非常状态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全国一切善良的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在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事态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事——1967－1969 写真

如何发展？如何收场？人们都在关注周恩来，希望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能妥善处置，稳住局势。周恩来果然不负众望，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日常工作，他提出了“碰头会”的办法。2月2日，他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风雪交加，寒气逼人。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怀仁堂会议里，铺着白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正中间坐着周恩来，一侧坐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两军对峙，阵垒分明。这次会议原拟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三大重大原则问题作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怀仁堂。

陈伯达、康生等人在京西宾馆刚刚被“大闹”之后，因为有毛泽东给他们撑腰，气势又壮了起来，就上面几个问题，继续纠缠，仍然叫嚷“革命有理”，“老家伙该批”，军队就是要搞“四大”，气势压人。

这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接着，聂荣臻也生气地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恿一些不明真理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看到老帅们出了气，争论暂时不会有结果，便宣布休会。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

往事——1967－1969 写真

各口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春桥摆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委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他的话，大发震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质问：“删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这时，谢富治打圆场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周恩来看谭震林要退出会场，便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

会议顿时紧张起来，双方互相对视着。

这时，陈毅发言，打破冷场。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在长篇发言中触到了三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他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

接着，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大搞逼、供、讯。”

谭震林又开口了：“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从旁开导：“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生气地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件事，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

往事——1967 - 1969 写真

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样的话。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

陈伯达不得已，假意检讨：“我们疏忽了，今后一定注意。”

李富春严肃地提出批评：“如果我们不讲话，或者违背良心讲点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

陈伯达打圆场说：“我们回去一定认真研究。”

周恩来问康生：“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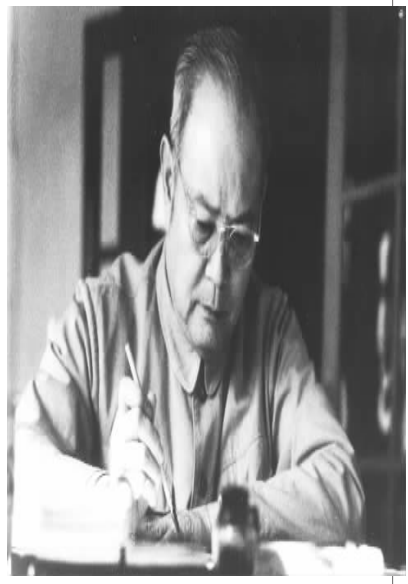
康生连说：“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疼。”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革命家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所谓“二月逆流”

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并未结束。会后第二天，被称为“谭老板”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很狡猾，将这封信报送毛泽东，并附信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火上烧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



1967年2月，叶剑英在北京的住所。

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抓住机会攻击周总理，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转告他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交文革小组讨论。”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便“顺理成章”了。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等人告“黑状”，特别是有人翻延安整风的老账，公开反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生气。

2月19日凌晨，他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16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

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康生说：“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为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检讨。

在批斗会上，康生气冲冲地说：“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主席嘛！”

江青无理指责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接着，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府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各种帽子、棍子满天飞来。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种种罪名，不一而足。而最大的罪名是将“大闹京西”、“大闹怀仁堂”以来“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批评“文化大革命”，诬蔑为“二月逆流”。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一幅幅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被迫停止。但批判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被反复折腾，直到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才有所缓解。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从此，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才淡了下来。

两个“大闹”的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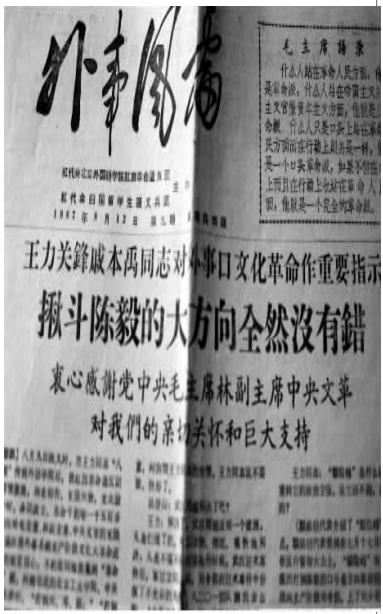
几位开国元勋，被打成“二月逆流”以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新老账”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惟独叶剑英还挂着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勉强地支撑着军委大厦。他和尚未被打倒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当时毛泽东提出“三支两军”，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

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几位元帅商量,提议召开军级干部会议统一认识,解决军队在“文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并就此事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作了专题报告。经过毛主席批准后,从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



复出不久的谭震林。 王东供稿



外事图书

毛主席语录

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对外事口文化革命作重要指示

揪斗陈毅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

衷心感谢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

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

小报关于揪斗陈毅的报道。 王东供稿

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他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三月份要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他又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

往事——1967-1969写真

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急迫。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归口，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应予以逮捕法办。3月17日，周恩来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十八）日上午集体一谈。"这一天，他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造反派"和党委委员时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对领导干部排个队，给他们检查的机会，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以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为例，告诉大家：前些日子我让他住中南海，保护起来，现在让他出来，以后不能再抓人了。

周恩来与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商量军管问题后，于3月18日致信毛泽东、林彪：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对每一部门派出三人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最后实现各部门的三相合。信中还就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军管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照办。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解决中央调查部，铁道、交通、邮电、财贸系统，大庆油田等各部门各单位的军管问题，并于3月28日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三个议题：（一）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二）关于国防工厂和国防科学研究院（所）实行军管的试行草案。（三）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如何分工负责问题。讨论后形成决定，付诸实施。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并亲自部署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林彪亲自出马，3月20日，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与会同志称赞这次会议开得及时，开得好，实际上"大闹京西"和"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范硕供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事——1967 - 1969 写真

“一读骚经一肃然”

刘东之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联在制造“珍宝岛”事件后，继续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形成南北夹击、四面包围之势。1969 年 10 月，中央向全国发布了战备命令。10 月 17 日，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王震等以及几位共和国元帅均被“战备疏散”到外地。这里单表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这位七十二高龄的老人，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下放到长沙。当时他的子女多数被抓进监狱，或“下放劳动”或在边疆服役，没有一个亲人同住，只有两名随行人员。

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总理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 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伙从军队系统却交待：要对“老机”叶剑英保持距离。于是，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湖南历时十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湖南省领导人对这位中央的“老机”，格外小心谨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但是，有些领导和干部出于对老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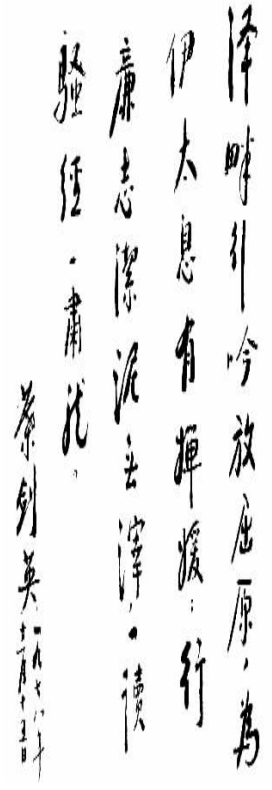


“流放”湖南时的叶剑英。右为胡家虎。

热爱，挺身而出，有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元帅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省委接待处长肖根生和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决定抽调排长胡家虎给叶帅当专职警卫员。据胡家虎回忆，那时湖南，已是深秋。叶帅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立即搬走。祸不单行。就在这时，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远在上海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送往大医院抢救。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想再打听儿子的抢救情况，要求晚一天离开长沙，但没有获准。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愉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才知道，当时赶他紧急从长沙迁往湘潭，是因为毛主

往事——1967－1969 写真

席要来长沙安排住“蓉园”。叶剑英听到这个情况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因为，离开北京前，周总理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说：“叶剑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但是，有人封锁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叶剑英当时在长沙，更不知道因自己来而赶走这位信得过的老人。



湘潭比起长沙，不仅生活条件要差的多，而且“上边”指示，对这个“老机”“老右”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密”。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这里想给远在上海受伤致残的儿子打个电话，却遭到电话员的粗暴呵斥。他气得发抖，无奈只好含着热泪给孩子写信，安慰孩子。“大丈夫一息尚存，还可能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健全，只差一支手，决不气馁……”

这时正值数九寒天，湘潭地区寒气逼人。叶剑英在这里，不但生活上很少有人关心过问，饭菜也不可口。为了改善他的生活，胡家虎和炊事人员只好“自己采购、自负盈亏”。后来，多亏下放到江西的王震来看他，找到以前的老部下，才有所改善。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尽管体弱多病，遭受冷遇与屈辱，但依然心系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离开湘潭，叶帅还到岳阳等地转一转，看一看。他登盼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高声朗诵范仲俺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其志可见。每到一地，他都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力争多去参观访问，了解世情民俗，接触平民百姓。他先后去过长沙曙光电子管厂，湘潭钢铁厂，岳阳橡胶制品厂、榨糖场、渔场搞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搞调查很不容易，不仅有时受到冷遇，而且交通工具也解决不了。他到岳阳橡胶厂，是坐铁路上的一节抢险车（车上没有座位）滑行过去的。下车后，首先要步行走过十多米宽的铺着碎石的多条铁轨的路基，然后还要步行一里多路才能到达工厂。这对年逾七旬、身体多病的老人来说，多么艰难啊！可是他到了工厂后，没有休息，就一个车间接着一个车间去参观，对原料来源、价格、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都很详细地了解，还询问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情况。到了中午开饭时间，他到职工食堂边吃边问：工人的粮食定量是多少，菜的价格是多少？……在工厂调查时，他不让暴露身份。经过多次到一些工厂，同工厂的干

部、工人座谈，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座谈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准备报送中央。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英语，即使病中也不放下书本，并且读得很认真。除读书外，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和《参考消息》，他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备录。他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渠道。因为在那远离首都的偏僻的地方，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也没人来看他，甚至电话都很难打出去，所以消息很闭塞。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中国内外的新闻广播。为了收听得及时，他选好几个电台的新闻广播时间，都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都亲自一个一个找出来，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划上记号。

叶剑英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和他身边的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天，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有知识、有头脑、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

他胸怀宽阔，善于关心人、体贴人、谅解人。尽管"自身难保"，他还用自己懂得的中医方面的知识，帮助身边人员的亲属开方治病，帮助解决家庭困难。有时厨师做的饭菜不对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时，他告诉厨师说，不是菜烧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说胃口不好。剩下的饭菜，下一顿接着吃，不浪费。在"流放"期间，生活单调枯燥，叶剑英善于自我调济生活。除了读书看报背诗外，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有时与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自得其乐。心有所感，则抄诗吟诗填词以明志。他曾改写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这是叶帅当时逆境生活和乐观心态的真实写照。

1970 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蝉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随行人员不能给下边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经常写信教育子女，告诫晚辈："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接到孩子回信，激动地写道："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

往事——1967 - 1969 写真

往事——1967－1969写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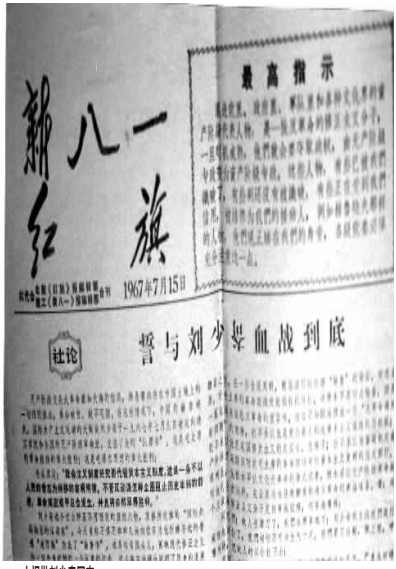
刘少奇的三顶大帽子

王 东

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他受尽折磨，于



1959年，刘少奇接见北京清洁工人时怀祥。



小报批刘少奇同志。



老太太忆苦思甜。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开封含冤病逝。后来经过认真复查弄清楚，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前的统计，因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二万八千多人。

1968 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当时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 52.7%。（本文照片由王东供稿）

往事——1967 - 1969 写真

周恩来在 1968

蒋 铎

在解放前我童年时就听父亲说过：“共产党里面有能人啊，毛泽东、周恩来……”童年的记忆是最难忘的。解放后，尤其是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后对周总理的感情认识更深了。我第一次拍摄周总理是 1963 年 4 月 24 日，他在首都机场陪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向首都群众告别。总理红朴朴的面容、锐



1963 年 4 月 24 日周总理在首都机场为埃及副总理萨布里送行。 蒋铎摄

利的目光、特有的手势、矫健的步伐……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

1966 年 8 月 18 日并非什么节日，却是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天。这一天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一天有很多非同寻常的事情——毛主席打破常规很早就上了天安门，还提出要穿军装。大约中午时分，周总理从天安门城楼下来，看望金水桥边的红卫兵，与他们合影，带领他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都是以往庆祝大会没有的。

上天安门拍摄的记者名额很少，怎么样才能有更多的拍摄机



1966 年 8 月 18 日周总理在红卫兵中间。 蒋铎摄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手拿《毛主席语录》，笑得合不拢嘴。 蒋铎摄

会呢？我梦想能在金水桥前用望远镜头拍摄毛主席。远水解不了近渴。进口长镜头手续繁杂，来不及了，七打听八打听，了解到国家体委登山队有 1000 毫米的望远镜头，吕相友老师出面联系。说拍摄毛主席谁不支持呀，我如愿以偿。10 月 1 日，是国庆节，也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我成为当时除新华社记者外，用望远镜头在金水桥前拍摄毛主席的第一人（以后首都其他新闻单位也陆续进口了这类长镜头）。这是我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形象。我全力以赴拍摄毛主席。我也十分认真地拍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瞬间。当时林彪被定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林彪手拿毛主席语录、笑得合不拢嘴。这两幅照片必须拍好的。我完成了任务。10 月 2 日《人民日报》一版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